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6

河南大学出版社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6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6辑/苗长虹主编.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649-1450-9

I. ①黄… II. ①苗… III. ①黄河流域—文化史—丛刊②黄河流域—
可持续发展—丛刊 IV. ①K292—55②X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9520 号

责任编辑 陈林涛

特邀编辑 武 强 王洪伟

责任校对 天 赐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 25

字 数 237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26.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顾问：李学勤 冯骥才 陆大道 孙九林 牛文元
陈栋生 王 巍 马润潮(美) 李福清(俄)
戴福士(美) 吉尾宽(日)

主编：苗长虹

副主编：高有鹏 牛建强 刘东勋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创琳	王蕴智	孙一飞(美)	许学工	刘彦随
李小建	李玉洁	李振宏	张大新	张云鹏
张新斌	杨云彦	杨伟聪(新)	杨朝明	侯甬坚
耿明斋	晁福林	秦耀辰	康保成	程民生
樊 杰	魏也华(美)		魏后凯	戴松成

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

目 录

专论

- 上古中原文明领先优势及其复兴的历史合理性……………王子今(1)
- 何谓“黄河学”?如何“黄河学”?——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王宏伟(13)

历史地理研究

- 先秦秦汉时期的“河南”地域称谓……………崔建华(28)
- 唐至辽代桑干河流域城市的发展与分布……………孙靖国(40)
- 唐中后期至五代都城管理制度的演变……………张春兰(59)
- 唐宋时期制砚业重心的地理变迁……………陈 涛(72)
- 区域变迁背景下的唐代藩镇——以淮西节度使为例的分析……………武 强(89)

制度与文明演进

- 论“越州密务”……………李民举(101)
- 唐代宗时期的藩镇问题——以河朔藩镇为中心……………胡 平(117)
- 唐代名将郭子仪家族婚姻与其政治社会地位探析……………马建红(128)
- 洛阳新出唐李孟德基志研究……………李 永(135)
- 春秋时期农业收成为夏秋两季……………翟胜利(143)
- 孔子、孟子眼中的尧舜禹——《论语》《孟子》中对尧舜禹评价的比较 ……张东微(146)

学术信息

- 第四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153)
- 全球视野下的黄河文明起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155)

上古中原文明领先优势及其复兴的历史合理性

王子今

摘要:以河洛地方为主要基地的中原文化优势对于华夏文明奠基的有着特殊意义,这一地区在先秦时期已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地区。虽然全国经济重心在六朝之后实现了向东南方向的转移,王朝行政中心后来移据华北,进入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又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条件,然而中原地区丰厚的文明基础长久地发挥着历史作用。即使在中原地方并不作为全国行政重心的时代,其地位依然显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原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新,自有历史的合理性。

关键词:中原文明 复兴 历史合理性

作者简介:王子今(1950年~),男,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著有:《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交通史稿》《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等。(北京 100872)

《易·系辞上》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体现出以河洛地方为主要基地的中原文化优势对于华夏文明奠基的特殊意义。《逸周书·作雒》说,洛阳地处“土中”,“为天下之大凑”。《史记》卷四《周本纪》记载,周公曾经强调:“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说,“周人都河南”,充分重视到其地“在天下之中”的地位。战国时期,“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河洛地区商人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这一地区又成为天下行商的中心。区域文化地位的历史变化有复杂的原因。全国经济重心在六朝之后实现了向东南方向的转移,王朝行政中心后来移据华北,进入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又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条件,然而中原地区丰厚的文明基础长久地发挥着历史作用。中原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新,自有历史的合理性。

一、早期部族国家最初生成的文明先进地区

有学者指出:“早在距今约 4000 年的龙山文化晚期,河南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城堡,它可以称之为城市发展史上的胚胎期。”^①20 世纪 30 年代初,安阳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过“应该也属于城堡的夯土墙基”。“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鄆城郝家台都经过大面积的科学发掘。”据考古工作者总结:“这一时期的城堡,大致呈正方形,面积在 1 万至 4 万平方米。城内布局主要是排列有序的排房建筑,城垣的夯筑技术还比较原始,淮阳平粮台古城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南门的门卫房,南门路土下敷设的陶排水管道,说明当时的城市建设,已经具有一定的规划。”^②新密新砦的发现,也提供了认识早期城址形制的重要信息。^③相关考古收获,还有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④、平顶山蒲城店龙山文化城址^⑤、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址^⑥、博爱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⑦、新密新砦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城址^⑧、郑州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⑨等。有的考古学者认为,“城址是‘文明’的最为重要的物化载体,是国家的最为主要的政治统治、文化礼仪、经济管理、军事指挥活动的‘平台’”^⑩。对于这样的论点或许因有的成熟的文明未必发现了这样的“载体”而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城址确实是重要的判定条件。苏秉琦划分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但是仍然肯定“中原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⑪。各“区系”之间文化进程的未必同步和文明积累的未必平衡,则可以通过考古资料和历史资料的具体分析有所认识。我们这里的讨论,“中原”的定义与苏秉琦“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⑫有所不同,区域界定主要以现

① 杨育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年 12 月版,第 41~43 页。

② 赵春青:《新密市新砦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4》,文物出版社,2005 年 8 月版,第 244 页。

③ 蔡新法:《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4》,第 240 页;蔡新法、马俊才:《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6》,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版,第 269~270 页。

④ 魏兴涛、赵文军、楚小龙:《平顶山市蒲城店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6》,文物出版社,2007 年 10 月版,第 269~270 页。

⑤ 《中国文物报》2007 年 2 月 2 日,《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址及西周至汉宋明清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7》,文物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⑥ 王青、王良智:《博爱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8》,文物出版社,2009 年 7 月版,第 270~271 页。

⑦ 赵春青:《新密市新砦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第 244 页。

⑧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 年 11 月版。

⑨ 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10 年 4 月版,第 11 页。

⑩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年 4 月版,第 28~32 页。

⑪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 30 页。

今河南省内的黄淮流域地方为主。^①

二、早期城址与鲧禹神话

所谓“城垣的夯筑”，是早期文明的主要标志。在黄河流域原始时代末期，华夏文化共同体迈上文明的初阶，是以鲧、禹治水由失败转而成功作为鲜明的历史标志的。《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和《史记》卷二《夏本纪》中，有关于鲧治水失败受到惩处，又以禹接替治水事业的记载。鲧治水事迹，其实是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这样的记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者。”对于“息壤”的解说意见纷杂，我们以为应当重视东汉学者高诱的判断。《淮南子·地形》：“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高诱注：“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按照高诱的说法，“息土”的神性，其实正在于“不耗减，掘之益多”。能够迎洪水冲激而“不耗减”，正是夯土的特征。夯筑层土，令其坚实，以阻御洪水，是传统防治水害的方式，即吕思勉所谓“此盖古代治水诚有之事，抑亦其恒用之法”。吕思勉又就《国语·晋语下》的记载有所分析：“太子晋言共工‘隳土堙卑’^②，即取土壤以填低地之事。其云‘壅防百川’，‘壅’者遏绝之；欲‘堙卑’，斯必不免于壅川矣。‘防’者，筑为堤防，《史记》所谓鲧作九仞之城以障水也。”^③注意到“息壤”和“城”的关系，是重要的发现。

不仅“不耗减”，而且“掘之益多”，体现出夯土的基本特性。夯土密度大于一般土壤，更大于新掘之疏土，可能是“息壤”神话之所以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

成书于汉代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卷五《商功》中，有计算“功程积实”的算题，指出了汉时建筑工程中土方测计的一般比例：“今有穿地积一万尺。问为坚、壤各几何。答曰：为坚七千五百尺。为壤一万二千五百尺。术曰：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为墟四。以穿地求壤，五之；求坚，三之；皆四而一。以壤求穿，四之；求坚，三之；皆五而一；以坚求穿，四之；求壤，五之；皆三而一。城、垣、堤、沟、塹、渠，皆同术。”对于土壤结构的这种变化，刘徽解释说：“‘壤’谓息土。”“‘坚’谓筑土。”“‘墟’谓穿坑。此皆其常率。”《说文·土部》：“壤，柔土也。”段玉裁注引麋信云：“齐鲁之间谓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④按照《九章算术·商功》中提出的比率，“穿地”即掘地体积为4者，则掘出的“壤”，即“柔土”、“息土”体积为5，而再夯击为“坚”，即“筑土”，则体积为3。可见，夯土即“坚”和疏土“壤”的体积比

① 《国语·晋语三》：“……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讎。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史记》——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语：“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中原”都不包括秦国重心地方即“关中（陕西）”。

② 今本《国语》作“堕高堙卑”。

③ 吕思勉：《共工、禹治水》，《吕思勉读史札记》甲帙“先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5页。《淮南子·原道》：“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艺文类聚》卷六三引《淮南子》曰：“鲧作九仞之城。”引《博物志》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

④ 《春秋谷梁传·隐公三年》杨士勋疏引麋信云与此文同。

例为3:5。刘徽“‘壤’谓息土”,“坚’谓筑土”的解释,特别值得我们注意。^①

曾经“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的鲧,又是传说中城郭建筑的创始者。《吕氏春秋·君守》:“夏鲧作城。”高诱注:“鲧,禹父也,筑作城郭。”《世本·作》也写道:“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也有“夏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意林》引《风俗通义》:“按《世本》:‘鲧作城郭。’城,盛也;郭,大也。”^②《初学记》卷二四引《淮南子》:“鲧作城。”引《吴越春秋》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钱穆曾经论述“城”的早期作用:“耕稼民族的筑城有两种用意:一是防游牧人的掠夺,而另一是防水灾的飘没。”^③徐旭生也曾经指出:“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说就叫做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做堤防。”鲧所筑之堤防,“也就是鲧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约就像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叫做护庄堤”^④。宋代诗人刘克庄《登城五首》之四:“漫费人蒸土,常如物溃堤。傍疑为息壤,下恐有蟠泥。”^⑤就由“城”、“堤”联想到“息壤”。中国远古先民发明和应用的夯土技术,是适应黄河中下游地区较普遍的地理条件的最经济的最有效的工程形式之一。中国夯土技术的出现,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上记录了极富光彩的一页。以最普通的材料,用最简便的方式,筑土防洪,水涨堤高,可能正是“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神话的由来。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东西相连、先后修筑的两座夯土围墙建筑。其中一座略呈方形,西墙和南墙各长90多米,有人认为此处作为防御性设施的城堡,很可能和禹都阳城有关。其建筑形式是,先下掘基槽,然后在基槽内填土,逐层夯筑,当与地面相平时,夯土层再向两侧加宽,继续向上夯筑,从夯土印痕看,当时是用河卵石作为夯筑工具的。河南淮阳平粮台还发现了另一处早期城址。城墙的建筑方式比较原始,即先用小版夯筑宽度不足1米的土墙,然后以此作为城墙内壁,在其外侧堆土呈斜坡状层层夯实。从夯印看,当时曾经使用以4根木棍合绑而成的简单夯具。王城岗城址东城的东墙、北墙、南墙东段和西墙北段,都被山洪和河水冲毁。^⑥平粮台城址仅留宽1.7米的城门。^⑦这些迹象,似乎也都可以说明防洪可能确实是早期城郭建筑的主要目的之一。^⑧

鲧禹治水神话发生于历代水害频繁的中原地方,而文明初期的城址也在这里集中发现。讨论中国城市史,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

① 明人杨慎《升庵集》卷五《息壤辩》引“《九章算术》云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壤是息土”,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一五引“《九章算术》穿地四,为壤五,壤为息土”,然而都没有继续深究“息壤”“息土”之说。

② 《水经注·河水二》:“《世本》曰:‘鲧作城。’《风俗通》曰:‘城,盛也,从土成声。’”

③ 钱穆:《论秦以前的封建制度》,《读史杂志》,第2期(1939年6月)。

④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46页。

⑤ 《后村集》卷一二。

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

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⑧ 参看王子今:“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中州学刊》,2003年5期。

三、中原的“群都”

《周礼·天官·小宰》：“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郑玄注：“群都，诸采邑也。”^①这里说到“群都”，似并未有关注历史区域文化的思考。蔡邕《述行赋》记录作者中原行旅感受，最后也说到“群都”：“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②这是一篇在特殊背景下综合空间和时间诸条件进行历史文化思考发表的深沉感叹。其中所谓“历观群都”，是“述行”的交通实践记录，也是怀古的历史文化感叹。推想当时蔡邕“历观”的“群都”，很可能主要是东周的城郭建筑遗存。

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坏城郭”。碣石刻石辞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所谓“堕坏城郭”，张守节《正义》解释说：“堕，毁也。坏，圻也。言始皇毁圻关东诸侯旧城郭也。”作为创造“天下咸抚”之重要条件的措施，似未可排除决策者在“土域”、“地势”、“险阻”诸层面之上，另有文化象征方面之考虑的可能。一如《艺文类聚》卷六引《地理志》曰“秦望气者云东南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云阳县北冈，改名曲阿，又曰天门”故事。这种“堕坏”，很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战国名都遗址，“关东诸侯旧城郭”如燕下都、赵王城、郑韩故城等依然保持着惊人的高伟。先秦旧都，在一定意义上仍保留有秦始皇以为“无道”“暴逆”的政治影响的遗存。这一情形，在中原地区有更鲜明的表现。

中原地方是早期部族国家最初生成的文明先进地区，后来又有夏商周三代久远的文化积累。

夏都阳翟、斟寻、商丘、斟灌、原、老丘、西河等地。商都亳、囂（囂）、相、邢（庇、耿）、奄、殷等地。^③文献记录的这些地点，有的已经为考古学收获所证实。这些都城，多数可以确定位于中原地区。周王朝则在洛阳建设了空前规模的都城。于是研究者对于中国都城史的分期，有按照地域集中的特征，将前期称为“中原期”的。^④对于夏商时代的都城，有学

① 陆德明《音义》：“注辞曰云‘群都，诸采邑也’者，谓大都、小都、家邑三处也。”《周官义疏》卷三引李叔宝说：“群都亦谓公邑也。”

② 《蔡中郎集》卷四。《文选》卷一四鲍照《舞鹤赋》李善注引作《述行赋》。卷二八陆机《前缓声歌》李善注引作《述征赋》。又《水经注》卷七《清水》亦引作《述征赋》。

③ 参看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9～38页。

④ 参看叶晓军：《都城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7～8页。

者以为“屡迁”之说不可信,认为当时实行着“主辅都制度”。^①“屡迁”说和“主辅都制度”说两种意见的区别,一说在大致同一时间使用这些都城,一说在不同时间相继使用这些都城。这样的异见,其实并不严重影响我们对上古中原地区“群都”现象的考察。

有学者说:“都城是每个朝代的政治中心。”^②其实,应当注意到中国古史有若干政权分立的时期。如果仅仅以统一王朝的政治模式理解历史,会形成空白和缺失。而秦统一以前如两周历史文化热烈灿烂的局面,如果只以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来理解社会文明的基点、枢纽和重心,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中原地方经过大面积发掘的商代都城遗址,有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面积约190万平方米、郑州商城遗迹面积300万平方米,安阳殷墟的范围约30平方千米。除安阳殷墟尚未发现城垣外,偃师尸乡沟商城和郑州商城都有用版筑法分层分段夯筑的城垣。

东周时期,中原的“群都”形势有更典型的体现。河南经过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认识的东周列国都城和重要城邑,有新郑郑韩故城、上蔡蔡国故城、潢川黄国故城、濮阳戚城、偃师滑城、辉县城关共城、淮阳陈楚故城、淇县卫国故城、洛阳东周王城、登封阳城、商水扶苏城、淮滨期思古城等30余座。已经进行考古工作的列国都城,面积悬殊。郑韩故城达20余平方公里,蔡国故城约7平方公里,黄国故城只有约3平方公里。列国一般城邑往往在1平方公里左右。^③

对于这些重要都邑的形制、规模和内部结构的认识,已经取得了许多具体的信息。

四、战国时期中原作为盟会中心的地位

战国时期,中原曾经是列国会盟的主要地点。战国晚期,列国在河洛地区会盟频繁。自秦武王时代至战国时期结束,史籍记载各国间以“会”为标志的外交活动凡19次(见下页表):

①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5页至第66页。论者以为这种“主辅都制”对东周一些诸侯国形成影响。楚之都城为郢,但《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在陈、蔡、不羹三县筑城,“赋皆千乘”,称为“三国”。韦昭注曰:“三国,楚别都也。”武城也是楚的辅都之一。“武城有宗庙,楚王常到武城驻次。鄢更是楚的辅都之一。”“齐国在战国时代曾实行五都制度。据《战国策·燕策一》记载,除主都临淄之外,齐国在四境分设平陆、高唐、即墨、莒辅都。燕之主都为蓟,另设下都辅都。”“郑国曾有别都柘。”“战国时期秦国都城雍、栎阳二都并存,亦应为主辅都制。”第222页。今按:所说栎阳为秦都不确。认真分析文献记载,并证之以考古资料,可知栎阳非秦都。参看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3期。

②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9页。

③ 杨育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1页至第43页。参看王子今:《中原“群都”现象:上古文明史和国家史的考察》,《中州学刊》,2012年4期。

序号	时间(年)	会盟国	会盟地点	资料出处
1	公元前 310	秦—魏	临晋(今陕西大荔东)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四《魏世家》
2	公元前 308	秦—韩	临晋外(今陕西大荔东)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韩世家》
3	公元前 308	魏—秦	应(今河南宝丰南)	《史记·六国年表》、卷四四《魏世家》
4	公元前 304	秦—楚	黄棘(今河南南阳南)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〇《楚世家》
5	公元前 302	魏—秦	临晋应亭(今陕西大荔东)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四《魏世家》
6	公元前 302	韩—秦	临晋(今陕西大荔东)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五《韩世家》
7	公元前 300	魏—薛	釜丘(今山东定陶西)	《水经注·济水一》引《竹书纪年》
8	公元前 299	齐—魏	韩(今河南新郑)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五《韩世家》
9	公元前 285	秦—楚	宛(今河南南阳)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〇《楚世家》
10	公元前 285	秦—赵	中阳(今山西中阳)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三《赵世家》
11	公元前 284	魏—秦	西周(今河南洛阳)宜阳(今河南宜阳西)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四《魏世家》
12	公元前 284	韩—秦	西周(今河南洛阳)新城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五《韩世家》
13	公元前 283	秦—楚	鄢(今河南漯河西)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四〇《楚世家》
14	公元前 283	秦—楚	穰(今河南邓州)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〇《楚世家》
15	公元前 282	秦—韩	新城	《史记》卷五《秦本纪》
16	公元前 282	秦—魏	新明邑	《史记》卷五《秦本纪》
17	公元前 282	韩—秦	两周间(今河南洛阳)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四《韩世家》
18	公元前 279	赵—秦	滏池(今河南滏池西)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三《赵世家》
19	公元前 278	秦—楚	襄陵(今河南睢县)	《史记》卷五《秦本纪》

其中“新城”地望不详,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可见 3 处“新城”,一在今河南伊川西,一在今河南密县东,一在今山西朔州南。^① 清人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卷首下《春秋战国通表下》“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284)条下写道:“秦昭王与魏昭王会宜阳,与韩釐王会新城。《年表》云:与秦王会西周。”“周赧王三十三年”(公元前 282)条下写道:“秦王与韩王会新城。《年表》:韩与秦会西周间。”似陈厚耀以为“新城”其地即在今河南洛阳。《史记》卷五《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 282),“与韩王会新城,与魏王会新明邑”。按照常理分析,“新明邑”应在韩魏地方,很可能也在河洛地区。包括秦武王与甘茂息壤之盟,则战国晚期各国会盟 20 例中,其地属于河洛地区者,有(1)(2)(3)(4)(5)(6)(8)(9)(11)(12)(13)(14)(15)(16)(17)(18),又秦武王甘茂 1 例,共 17 例;与河洛

^①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 年 10 月版,第 1 册第 35~36 页,第 37~38 页。

地区距离较远者,只有(7)(10)(19)3例。

河洛地区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晚期成为会盟中心,原因之一,是强大的秦国在向东方扩张的进程中首先将这一地区作为侵吞的目标,并随即进而以河洛为兵员和作战物资的中继基地,向赵、楚、齐、燕等强国进军。

这一形势的出现,很可能也与周王朝政治权威虽然衰落,然而依然余威残存有一定的关系。当时新的“天下”观念得以普及,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历史影响,河洛地区于“天下”中心且曾经作为重心的地位自然益为突出,应当也是原因之一。^①

在东周时代列国政治领袖出行的历史记录中,以秦国历代国君远行经历最为醒目。他们主要的出行方向,也有面对中原的一致性。^②

五、列国都城趋向中原的转移

春秋战国时期,诸强国逐渐崛起,曾经出现外围地区强势集团压迫中原的新的局面。这一历史变化,正如《荀子·王霸》所说:“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中原周边地方的兴起,使得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原文明有渐次衰颓的趋势。李学勤将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7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和秦文化圈。又指出:“夏、商和西周,中原文化对周围地区有很大影响,到东周业已减弱……”^③有学者论说,因楚、吴、越的兴起,“重心开始南移”,“中国国都的精神,也开始锺灵于南部”^④。

战国时期的最为强盛的主要大国均处于中原外围,依然“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荀子·强国》说秦的“威强”“广大”,也使用了“地遍天下”,“威动海内,强殆中国”语。对照理解“中国”和“天下”、“海内”概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不可以简单地以为“中国”与“天下”、“海内”可以完全等同。^⑤《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载驹衍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与“天下”的空间感觉极

① 参看王子今:《论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的原因》,《中州学刊》,2006年4期。

② 参看王子今:《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③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1~12页。

④ 姜渭水:《中国都城史》,和平出版社,1957年1月版,第136~137页。

⑤ 对照《荀子》书中有关“中国”的表述,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文化地理涵义。《荀子·王制》论“王者之法”“四海之内若一家”,有这样的文句:“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紬、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知“中国”是指四海之内。又《荀子·致士》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其语言“天下”“王者”,而注家有谓:“《诗·大雅·民劳》之篇。‘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远也。”(《荀子》杨倞注)“中国”与“四方”为对,但是其空间界域,可能并不限于“京师”。应是指文化重心地带。

其悬殊。^①清代学者胡渭《禹贡锥指》卷一九则写道：“古之所谓‘中国’者，《禹贡》甸侯绥方三千里之地也。”所提出的认识，可能接近多数人的理解。

战国时期多数强国都有都城移动的历史。考察相关现象可以看到，列国都城的迁徙又出现了一种与前说“僻陋之国”崛起的历史现象呈反向的趋势，就是向中原地方的靠拢。

以楚国为例，楚都起初在江陵郢城（今湖北江陵），楚顷襄王迁至陈（今河南淮阳）。于是其统治中心由江滨向北移动，迁到淮滨。其地临鸿沟，已经处于方城以外。此后，楚都又迁至巨阳（今安徽阜南），楚考烈王又迁都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楚都沿淮河向东移动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人们可以察觉，这一态势，与楚文化向北扩张，向北进取，方向是大体一致的。^②趋向共同的历史现象，是赵国都城从晋阳南移^③，魏都由安邑迁至大梁，秦都自雍城移至咸阳。^④燕国在蓟都之后，燕下都成为国家行政中心，也体现出往中原移动的趋势。趋向中原迁都动幅最大的，是越国自山阴迁都至琅邪。有学者指出，这一举措，与“句践灭吴后急于争霸关东的心态”有关。^⑤历史文献的相关遗存，有《吴越春秋》卷六《越王伐吴外传》：“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句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水经注·潍水》：“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⑥

列国都城趋向中原的转移，显示了占有文明之根基的意向和争夺政治之正统的雄心。

① 《盐铁论·论邹》载文学言：“邹衍非圣人，作怪误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是汉儒对于“中国”、“天下”、“四海”，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谋求“治”的“君子”来说，“中国”似是倾向于“近”“小”的空间概念。或只看作文化坐标，如清代学者李光地《记南懷仁问答》写道：“所谓‘中国’者，谓其礼乐政教得天地之正理。岂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榕村集》卷二〇《杂著三》。

② 参看王子今：《战国秦汉时期楚文化重心的移动——兼论垓下的“楚歌”》，《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③ 参看王子今：《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晋阳学刊》，2010年1期。

④ 参看王子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人文杂志》，2003年5期；《从鸡峰到凤台：周秦时期关中经济重心的移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3期。

⑤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11页。

⑥ 或说句践所迁琅邪在吴越间。已有学者驳议。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一九《史类二》：“《笔丛》曰：《竹书》：‘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吴越春秋》文颇与此合。然非齐之琅邪，或吴越间地名有偶同者。按：《山海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郭璞曰：‘琅邪者，越王句践入霸中国之所都。’《越绝书》曰：‘句践徙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何谓非齐之琅邪？”顾颉刚予相关历史记录以特殊重视。《林下清言》写道：“琅邪发展为齐之商业都市，奠基于一勾践迁都时。”“滨海之转附（之罘之转音）、朝儻、琅邪均为其商业都会，而为齐君所愿游观。《史记》，始皇二十六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今按：应为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正以有此大都市之基础，故乐于发展也。司马迁作《越世家》乃不言勾践迁都于此，太疏矣！”《顾颉刚读书笔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1月版，第10卷第8045～8046页。辛德勇《越王句践徙都琅邪事析义》就越“徙都琅邪”事有具体考论。《文史》，2010年第1辑。

当时正如李学勤所说,中原文化对周围地区的影响虽然已经“减弱”,“但仍不失为重要”。^①

六、中原文明领先优势现代复兴的历史合理性

区域文化地位的历史变化有复杂的原因。全国经济重心在六朝之后实现了向东南方向的转移,王朝行政中心后来移据华北,进入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又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条件。然而中原地区丰厚的文明基础长久地发挥着历史作用。

战国时期,河洛地区“为天下之大凑”^②,“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③的特殊地理形势,使得列国兵战往往于此争夺,由此进取。秦人东进,首先倾力于河洛战事。《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09年,秦武王曾经对秦名将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后来不久就派甘茂拔宜阳。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命白起为将,在伊阙会战中破韩魏联军。三年之后,“东周君来朝”。同年,秦昭襄王亲临宜阳。东周、西周两个政权的存在,虽极弱小,仍然得到列国的尊重。然而以强大军力积极东向的秦国终于不能容忍这两个小国控制河洛文化优势地区的事实。公元前256年,秦取阳城、负黍之后,又发军攻西周,次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秦人占有西周属地对于攻略东方的意义,可以由第二年“天下来宾”得到体现。秦庄襄王即位初,就命令相国吕不韦诛东周君,“尽入其国”,并“初置三川郡”,实现了对河洛地区的全面控制。让出身商人,极可能曾经于这一地区从事过经济、政治活动的相国吕不韦实际管理这一地区,也体现出其地位的重要。^④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嬴政在统一战争中亲自行临河洛地区,表明未来的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一地区特殊的文化地位的重视。^⑤秦始皇平生8次出巡,大约其中6次都行历河洛地区。《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记述刘邦与张良在洛阳南宫讨论行封功臣事,说到“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洛阳南宫有“复道”建筑,显然不可能是仓促营造,应是秦时故宫。由“南宫”之定名,可推知洛阳秦宫应当不止一处。看来,秦王朝曾经把洛阳看作统治东方的政治重心所在。秦始皇特别信用的重臣李斯,其长男李由被任命为三川郡(郡治在今洛阳)行政长官,而为赵高所忌毒,也有助于说明这一历史事实。

秦时以权臣李斯之子李由任三川郡守。^⑥汉代河洛地区作为“天下之中”的地位仍未

①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1页。

② 《逸周书·作雒》。

③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④ 参看王子今:《论吕不韦及其封君河南事》,《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年1期。

⑤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王之河南”。

⑥ 秦末战争中,三川守李由统率的部队曾经是与反秦起义军对抗的主力。李由军拒守荥阳,“吴叔弗能下”(《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又与起义军会战于雍丘等地。“击李由军”,“破李由军”,成为刘邦所部军官最重要的战功记录之一。参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卷九五《樊酈滕灌列传》、卷九八《傅靳蒯成列传》。

动摇。^①与李由故事类似的史例,又有《汉书》卷七四《魏相传》所见霍光语:“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子为武库令。”这里所说的“武库”,很可能是“雒阳武库”。刘邦初定天下,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他强调关中地理形势的优越,但是也肯定了河洛地区的地位。娄敬说:“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②《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和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说到汉武帝所幸王夫人为其子刘闳请封洛阳,汉武帝以洛阳“天下冲阨”、“天下咽喉”的重要地位予以拒绝。可见河洛地区“在于土中”^③的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形势,受到了突出的重视。

可见,即使在中原地方并不作为全国行政重心的时代,其地位依然显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原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新,自有历史的合理性。

这首先在于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已经不仅仅限于政治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即“资治”的眼光,而开拓了更广阔的文化视野。而考察区域文化的历史演进,人们首先关注着经济生活的意义。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俨然是联系地域相当宽远的经济中心。当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师史等,其行为风格其实也表现出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而按照《盐铁论·力耕》的说法,周地“商遍天下”,“商贾之富,或累万金”。《盐铁论·通有》又说,“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名臣桑弘羊,就是洛阳商人子。桑弘羊曾经推行“均输”制度,以改善运输业的管理。而两汉之际河南郡荥阳仍然存留“均输官”设置^④,由此也可以看到河洛地区经济地位的特殊。《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在分析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时指出,“周地”风习,有“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意为商贾,不好仕宦”的特点。班固说,这是“周人之失”。然而,如果承认商业对于增益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则“周人”对于经济流通的贡献,其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记载,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而“洛阳居中”,也说明随着关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洛阳作为经济领袖的地位愈益显著。

其次,现今学界在进行历史文化视角的区域史回顾时,已经纠正了以往自正统王朝立场进行观察形成的偏见。田余庆在总结中国古代统一和分裂的历史变化时曾经指出,“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的发展机会”,其他地方,“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他说:“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弥补。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

① 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光明日报》,2004年9月21日,《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西汉末年洛阳的地位和王莽的东都规划》,《河洛史志》,1995年4期。

②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③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④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的统一局面提供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①思考这种“不平衡现象”和“周期性的发展”的客观的历史存在,则可以理解中原地方在没有得到“优先的发展机会”的时代的“要缓慢一些”的进步,也值得进行学术发掘和学术研究。在这样的时期,中原地方为中国总体发展“提供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的作用,无疑也有必要有所总结,有所说明。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Ancient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of Its Revival

Wang Zijin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cultural advantage of the Central Plains, which takes the Heluo area as the main base,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area had become the country'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transportation center region in the Qin Dynasty. Although the economic gravity of the country transferred to the southeast after the Six Dynasties,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shifted to the north. In the modern times, the coastal areas got the preferent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ich basic of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was alway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 Even in the era which the Central Plains was not treated as the country's administrative center, its status was still influential. In the new era,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possess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of their own.

Key words: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Revival; Historical rationality

^① 田余庆:《古运河遐想——〈运河访古〉前言》,《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11月版,第383页。